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优化探索

崔慧姝 常洁 周望

摘要：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以27份政策文本为对象，可以构建起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分析二维框架，包括供给型工具、环境型工具和需求型工具这一X维度与人才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这一Y维度。在X维度中，环境型工具、供给型工具和需求型工具分别占比为63.7%、18.8%、17.4%。在Y维度中，以人才发展为主题的政策内容（69.85%）明显高于科技创新（6.85%）和产业变革（23.30%）。未来应增强供给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优化环境型政策工具、供给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构建“人才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共生发展体系。

关键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工具；政策文本

中图分类号：G71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4)04-0121-08

一、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职业教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1]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整个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职业教育具有教育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的育人价值和服务导向^[2]。

改革开放以来，贯穿于职业教育政策演变历程的主题一直是职业教育与社会的适应性问题。而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既是国民经济优质发展的需要，更是新时代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实践要求。作为新时代提出的全新命题，新质

生产力是科技革命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下所提出的新概念，正在通过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催生新产业、新的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这一过程中，科技是驱动社会生产力实现跃升的关键因素，创新链和产业链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支撑作用。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三要素组合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质生产力要求更高素质的劳动者辅助和推动经济发展，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劳动者必须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和具备多维知识结构、熟练掌握新型生产工具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数字经济时代下

基金项目：重庆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项目“中国式城市治理现代化成就融入高职城市管理类课程思政研究”（313）；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教改项目“讲好新时代城市治理成就：高职城市管理类课程思政教学创新与实践”（2023jgk012）。

许多数字衍生的技术应用于各个产业之中，生产工具也从传统的实体生产工具范围向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非实体工具方向发展。劳动对象既包含机械设备等物质形态，也包含数据等非物质形态。

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的重要性，而技能型人才是连接创新链和生产链的关键因素，关系到创新成果能否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新质生产力的语境下，职业教育需要通过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来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本。因此，构建起以职业教育为核心的人才、科技和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然而，当前有关于职业教育的各种研究文献，还未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如何全面助力新质生产力，展开充分探讨和分析。而来自实践方面的政策需求已迫在眉睫。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确立了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高质量政策导向。在中央政策指导下，各地陆续出台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和方案。基于如上认知，本研究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分析中央和省级相关政策文本，为优化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提供参考。

二、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文本的政策工具解析

（一）资料来源

本研究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关键词，访问国务院、各省市网站搜索相关政策文本，除去陕西、新疆、西藏、江西、海南、台湾、香港和澳门外，26个省级行政区出台了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共收集了27份（包含国务院在内）政策文本。

（二）研究方法和设计

以政策文本的“句”为分析单位，按照“政策文件一章编号一节编号一分析单元编号”进行编码，如1-2-2-1。从政策工具两个维度出发构建政策文本分析框架，结合政策文本内容对收集的27份政策文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按照编码原则，共得到2219条编码。

1.X 维度框架及分析

罗斯威尔(Rothwell)和赛格菲尔德(Zegveld)

的政策工具理论将政策工具分为环境面、供给面和需求面政策工具^[3]。本研究将根据罗斯威尔(Rothwell)和赛格菲尔德(Zegveld)的政策工具理论将政策工具分为环境型工具、需求型工具和供给型工具。根据“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要求和政策精神，在三类政策工具下设置了多个子维度。

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表现为政策的推动力，包括资金投入、办学模式、“三教”改革（三教主要指教师、教材、教法）、基础设施建设4个子维度。

环境型政策工具是为职业教育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具体包含目标规划、指导思想、类型定位、职教体系建设、体制机制（评价机制、标准体系、激励机制、财税政策和权益保障）、人事制度、招生制度、统筹规划、组织领导、宣传举措、文化培育11个子维度。

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是指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起拉动作用的政策，促进需求端对职业教育的倒逼改革，概括为示范试点、中外交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品牌建设、区域合作、理论研究6个子维度。

X 维度综合运用了环境型工具、供给型工具和需求型工具（见表1）。环境型工具运用最多为1414条，占比63.7%；供给型工具为418条，占比约为18.8%；需求型工具为387条，占比约为17.4%。从各类型的政策工具内部来看，每一类政策工具下的子维度工具使用结构失衡，环境型工具中体制机制运用最多（31.5%）；运用较多的是职教体系建设（19.1%）、统筹规划（18.3%）和目标规划（10.8%）；运用较少的是人事制度（4.6%）、组织领导（4.5%）、招生制度（3.0%）、指导思想（2.6%）、宣传举措（2.5%）和类型定位（2.0%）；文化培育最少（0.5%）。供给型工具使用最多的是“三教”改革（69.8%）；其次是办学模式（11.9%）和基础设施建设（10.5%）；最少的是资金投入（7.6%）。需求型工具中对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43.1%）使用最多；次之为中外交流（19.6%）和示范试点（16.2%）；较少的是品牌建设（8.7%）和区域合作（8%）；最少的

是理论研究（4.1%）。

表1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X维度工具分布情况

政策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数量/条	内部占比	各分类总数量/条	各分类占比/%
供给型工具	资金投入	32	7.6	418	18.8
	办学模式	50	11.9		
	“三教”改革	292	69.8		
	基础设施建设	44	10.5		
环境型工具	目标规划	153	10.8	1414	63.7
	指导思想	37	2.6		
	类型定位	29	2.0		
	职教体系建设	271	19.1		
	体制机制	446	31.5		
	人事制度	66	4.6		
	招生制度	43	3.0		
	统筹规划	260	18.3		
	组织领导	65	4.5		
	宣传举措	36	2.5		
	文化培育	8	0.5		
需求型工具	示范试点	63	16.2	387	17.4
	中外交流	76	19.6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167	43.1		
	品牌建设	34	8.7		
	区域合作	31	8.0		
	理论研究	16	4.1		

在环境型工具占比最多的是体制机制、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统筹规划。体制机制又可以细分为评价机制、标准体系、激励机制、财税政策和权益保障五个方面。政策文本内容强调对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考核评价、教师考评工作和绩效管理机制，发挥考评机制的反馈作用和改进作用。将学生就业率作为专业评价标准，及时淘汰与社会衔接程度低的专业。运用激励机制促进校企合作、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教育机构参与社会人才培养等。健全课程、专业、资格认证等标准化体系。权益保障主要是针对学生在企业实习时涉及的相关权益。统筹规划主要涉及政府整合区域内职业教育资源、数字资源，实现资源在区域内的共建共享。

在供给型工具中运用较多的为“三教”改革和办学模式。“三教”改革包括教师、教材、教法。在进行编码时，将专业和课程建设也纳入了“三教”改革中。“教师、教材、教法”是培育职业教育人才的三大要素。教师要素是学生创新能力和操作技能培育的引导者。政策要求培育“双师型”

队伍，教师既要具有理论知识，也应具有实操技能。

需求型工具的运用主要是围绕着“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形式更加多元化，企业与学校共同办学，参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同学校共建共享实训基地和教师培训基地建设，建立合作关系，允许学生和教师进入企业进行实践。品牌建设对于提升职业院校自身影响力和增强区域竞争力具有积极作用。品牌建设涉及区域品牌、院校品牌、名师工匠品牌，旨在建设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品牌。区域间的合作和对外交流利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区域就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校企合作和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等相关方面的经验进行交流，吸收借鉴成功经验，助力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2.Y 维度框架及分析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为了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任务提出的政策导向。在这一政策导向下，职业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与技能型社会相衔接，以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为办学定位和发展导向，提高学校与社会、产业、企业的耦合度，为技能型社会输出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在建设人才强国、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4]，根据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将Y维度分为人才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变革。

在“人才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三个方面使用了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见表2）。在三大类政策内容中占比最多的均为环境型工具，这与政策文本使用的环境型工具最多相关。人才发展中环境型工具占比为65.61%；科技创新中环境型工具占比为50.66%；产业变革中环境型工具占比为61.90%。环境型工具内部的具体政策工具在三大主题中运用程度也不同，关于人才发展，运用最多的前三个环境型政策工具依次为体制机制（31.07%），职教体系建设（22.52%）和统筹规划（14.65%）；关于科技创新，运用最多的前三个依次为体制机制（42.86%）、统筹规划（23.38%）和职教体系建设（18.18%）；关于产业变革，运用最多的前三个依次为体制机制（30.31%）、统筹规划（29.06%）和目标规划（15.63%）。

表2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X维度和Y维度政策工具交叉分布状况

政策工具类型		人才发展	科技创新	产业变革
供给型工具	资金投入	19		13
	办学模式	42	2	7
	“三教”改革	225	26	41
	基础设施建设	40	3	1
交叉数量/条		326	30	62
环境型工具	目标规划	94	6	50
	指导思想	20	1	16
	类型定位	24		5
	职教体系建设	229	14	28
	体制机制	316	33	97
	人事制度	61	2	3
	招生制度	40		3
	统筹规划	149	18	93
	组织领导	44		21
	宣传举措	29	3	4
文化培育	8			
交叉数量/条		1017	77	320
需求型工具	示范试点	38	3	22
	中外交流	53	5	18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85	21	61
	品牌建设	17	4	13
	区域合作	12		19
	理论研究	2	12	2
交叉数量/条		207	45	135
Y维度各类别总数量/条		1550	152	517

供给型工具在人才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中占比分别为21.03%、19.74%、11.99%；需求型工具在人才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3.35%、29.61%和26.11%。关于人才发展主题的政策内容，其中需求型工具运用最多的为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41.06%），最少的为理论研究（0.97%）；供给型工具中运用最多的为“三教”改革（69.02%），办学模式（12.88%）、基础设施建设（12.27%）和资金投入（5.83%）较少。关于科技创新，供给型工具中涉及三教改革（86.67%）最多，基础设施建设（10.00%）次之，办学模式又少于基础设施建设（6.67%），而资金投入中并未涉及对科技创新的经费来源和经费占比的具体描述；需求型工具中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46.67%）最多，理论研究（26.67%）次之，中外交流（11.11%）、品牌建设（8.89%）和示范试点（6.67%）较少，而区域合作并未涉及。关于产

业变革政策，供给型工具中运用最多的是“三教”改革（66.13%），剩余的依次为资金投入（20.97%）、办学模式（11.29%）、基础设施建设（1.61%）；需求型工具运用最多的为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45.19%），示范试点（16.30%）、区域合作（14.07%）、中外交流（13.33%）和品牌建设（9.63%）较少，运用最少的为理论研究（1.48%）。

总体而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文本在Y维度“人才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这三种政策内容的使用上存在不同的侧重点。人才发展（69.85%）此类政策比重明显高于科技创新（6.85%）和产业变革（23.30%）。关于人才发展的政策内容较为完善，关于产业变革的政策内容还较少，科技创新的政策内容明显缺位。

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优化路径

（一）提高供给型工具和需求型工具使用频率

从X维度的分析结果来看，政策文本中需求型工具的使用频率低于环境型工具和供给型工具，环境型工具相对于供给型工具和需求型工具而言存在使用过溢情况。应提高需求型工具和供给型工具的运用程度，强化需求型工具和供给型工具两类工具的使用，推动政策落地，提高政策实施效果。在供给型工具内部，政策制定者应重点关注办学模式。办学模式的改进利于吸收社会力量进入职业院校体系中，改善教育经费不足、职业教育适应性不足的问题。政府在出台政策引导办学模式改革的同时，应重视各办学主体责任划分。从政策层面明确监管部门和学校的职责、社会机构与企业的权责，规避在办学过程中各主体“推诿扯皮”的问题。在需求型工具内部，应重点关注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区域合作、品牌建设、中外交流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关于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政策内容的细致规定。强化区域合作，尤其是发达地区同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合作，推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配套使用区域合作和产教融合政策工具，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经济融合发展。优化品牌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品牌建设同环境型工具中的宣传举措配套使用。

（二）优化政策内部结构

经过分析发现，三种政策工具内部存在结构

失衡。从环境型工具来看,内部存在失衡。文化培育在环境型工具中存在明显缺位。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分流,是依靠成绩进行强制分流,自然而然使社会、学生和家长形成了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职业教育管理体系的混乱和刻板印象使得职业教育难以得到社会认同。要推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和融合发展,需要从文化观念进行转变。因此,应重视职业教育的文化培育,加大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创新宣传形式与宣传手段。职业教育要成为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选择,就需要从文化出发,在全社会中培育技能文化,创新传播机制,提升职业教育的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

而对于供给型工具,应完善资金投入的相关政策。首先,教育经费不足会抑制学校变革的活力,影响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投入。政策文本在优化教师结构中提出,可以聘请企业高技能人才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如若经费有限,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到校任教。其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为吸引学生选择职业院校,职业教育体系致力于优化办学条件;在“百万扩招”背景下,职业教育体系正在扩大职业学校办学规模;此外,为对接数字化城市和数字化国家建设,职业院校现阶段在推进智慧校园和数字化校园建设。上述活动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才可顺利推行。最后,建设技能型社会,需要建设全社会的技能培训体系,要求职业院校面向社会推进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经费不足难以激活学校和教师提供培训的积极性。政府应优化教育支出结构,推进社会资金向学校流动。

需求型工具中理论研究的应用程度明显低于其余政策工具。首先,完善理论研究的政策内容。理论研究需要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关于教学改革和教师队伍建设的理论研究,需要建立学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机制,遴选出具有特色且已经取得初步阶段成功的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因此需要政府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其次,应适当优化中外交流政策。高职教育国际化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职业教育国际化既包含职业教育走向国际,也包含国际职业教育走进国内。从过程来看,职业教育国际化体现为各项资

源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间进行流动。职业教育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流动需要相对完善的政策给予支持,对包含人员流动、项目流动、机构流动和标准流动^[5]在内的交流合作活动在政策方面进行宏观的规划与指导,加强规范管理。最后,要加强院校品牌建设、名师和名匠品牌建设与地区品牌建设,通过技能创新大赛、“名师名匠名校”评选工作挖掘品牌资源,充分发挥品牌效应,提升院校、教师个人和地区的影响力与竞争力。此外,优化区域合作机制,实现区域间在职业教育上的“共同富裕”,以强品牌效应的职业院校带动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体系改革。

(三)构建起人才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共生发展体系

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意味着职业教育办学定位面向的是社会 and 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普通教育相比,更加适合多元办学模式,即政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积极举办、社会力量深度参与^[6]。而产业需求端和办学供给端的适应性和衔接性明显有所缺失^[7],要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就需要构建起人才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共生发展体系。以人才发展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推动力,以产业变革为目标,依托于教育形成人才、技术和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这一发展格局与职业教育发展内涵一脉相承,能够为技能型社会在内部形成“供给—催化—储存”螺旋上升态势提供助力。

1. 人才发展

首先,化解职业教育“污名化”困境。扭转“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技能与劳动低人一等”的传统观念和“重知识轻技能”“重学历轻能力”的价值导向^[8]。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分流,是为了弥合技能型人才需求侧与供给侧的鸿沟,但在传统文化认知、社会重“学历”的思想、教育资源投入与分配不平衡、尚未完善的招生制度等^[9]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职业教育面临着“污名化”困境与评价。其一,强化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启蒙教育是一个由启蒙向职业启蒙到职业启蒙教育逐次的演绎过程^[10]。基于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在内的硬环境和政府所提供的政策制定、社会與

论、师资力量、学生素质在内的软环境，政府部门、企业、中一小一幼学校和职业院校合力打造职业教育启蒙场所，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和引导者应整合职业启蒙教育资源，构建幼儿园—小学—中学一体化的职业教育启蒙体系。其二，实现职教本科专业、专科专业与中等职教专业有效衔接，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上升通道。

其次，明确培养目标。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不同^[11]。社会需求明显转向高技能人才，在现阶段下，要重视职业教育本科建设和更高层次职业教育学历建设。高层次技能型人才是职业教育本科的培养目标。从政策层面全面系统地规划人才培养行动计划和高职教育改革计划，扶持优秀强劲的院校和专业，牵引高等职业院校打造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平台和实训基地。支持高等职业院校提升专业能力，培育数字化人才。密切关注政府公布的人才发展报告和就业市场数据，以此为依据调整培养目标。关注新兴产业、重点产业和供给能力不足的产业，确立职业教育体系的培养目标，确保培养人才的知识结构适应新业态和新技术的发展，同时又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12]，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

2. 科技创新

在教育与技术方面，我国实施“科教融汇”战略。科教融合旨在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作为紧密对接产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教育类型，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具有潜力^[13]。职业院校长期以来与科学研究领域并未形成紧密的联系，只专注于训练学生的技术技能，而忽视了对学生技术开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养成^[14]。科教融汇在于加强科研与教学的结合，构建产学研合作机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实现高水平科技创新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相结合^[15]，服务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和创新型技能型人才发展。

首先，打造开放型人才培养新体系。整合职业院校、社会企业和科研院所等科研主体力量和科研资源，打造开放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通过激励机制和具体收益回报吸引企业参与人才培养体系，与院校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建设学生实训基地、调整教学成果

评价标准。科学研究与预测产业发展趋势和技能需求，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与培养内容，优化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专业是连接教育、人才和产业的关键所在，专业建设能够反映教育对人才发展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的回应程度。系统分析产业发展需求与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的对接现状^[16]，根据“产业发展谱系图”和“职业教育专业建设谱系图”不断提升职业教育专业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对接水平。加强职业院校同科研院所和理论研究能力强的普通高等院校进行合作，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智库，为职业教育体系改革提供智力支持。此外，整合多方资源，形成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依托同科研机构的合作关系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实现教学成果和科研成果转化，提升职业院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培育具有科技创新精神和科技创新能力的人才。

其次，深化“三教改革”。“三教改革”指的是关于教师、教材和教法三个教学要素的改革。职业院校在教师、教材和教法建设上存在缺陷，普遍存在教师队伍科研创新能力不足、科研与教学失衡，教材对吸纳前沿科技成果不足，教学方法滞后于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17]等问题。在教师要素改革上，支持职业院校对接科研机构和社会企业进行科研交流；完善师资混编队伍建设，建立“双师型”队伍，由企业工程师和“专业群”教师^[18]打造一支能覆盖理论知识和实操技术的师资队伍。可将“课程教学、专业知识、行业能力、信息素养、研究与发展”^[19]作为“双师型”教师能力评价的一级指标，将教师的科研创新能力纳入教师评价体系当中。根据教师能力评价结果对教师进行分类，并针对每一类型的教师提供改进方案。在教材改革上，基于市场发展和发展的方向以及产业变革的要求，进行内容的编制；以“课程+项目”模式将项目中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要求及时融入教材^[20]，更新技术技能的实践知识；应用数字化教材，推动教材呈现形式的多样化。在教法改革上，创新传统教学方法，利用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开展教学活动，将与企业合作项目中运用的新型技术引入课堂；应用虚拟仿真技术搭建虚拟仿真场所；对接地区、

企业和产业需求开展融合型课程。

3. 人才发展和科技创新服务于产业变革

在教育与产业方面,实施产教融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应以产业变革为方向,根据产业变革的需要培育相应的人才,增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优化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21],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优化校企合作,创新产教融合的模式及手段^[22]。职教集团化办学通过“顶岗实习、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实现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率^[23]。通过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和“科教融汇”战略的实施助力校企合作模式创新和产教融合深入发展,建设产教联合共同体。

首先,明晰产教联合共同体的定位。产教联合共同体是推进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的新模式,是服务于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根据地区的发展特色,发展具有竞争优势和本地特色的专业,建设高水平专业群。选择能有效满足区域发展需求侧的供给端即职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与具有发展优势的本地产业和企业进行深度合作。政府进行统筹规划,整合区域内的各类教育资源参与区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实现内部职业教育体系纵向层次的有效衔接,市级、县级和乡村地区有效对接,院校与企业、行业和产业精准对接。

其次,产业教联合共同体实现“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24]。产教联合共同体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核心在于数据的价值,实现联合体内部的共建共享,可以有效降低各参与主体的风险^[25]。政府完善配套措施,引进前沿数字化技术,搭建多方主体沟通平台、政策宣传平台和资源共享平台,打破地区、职业院校、企业和科研机构沟通信息差现状,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不同主体间,诸如院校与企业、省市县乡村、院校与地区、城市与城市等的精准对接发展,实现资源的共享与转化。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22-07-22.

[2] 陈昌, 赵志纯.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动因、指向逻辑及其推进路径 [J]. 职教论坛,

2023, 38 (12).

[3] ROTHWELL R, ZEGVELD W.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M].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1985: 16.

[4] 罗哲, 张云具. 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历史脉络、理论逻辑与路径构思——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视角 [J]. 社会科学辑刊, 2024, (1).

[5] 于畅, 吴双. 新时代高职教育国际化评价的内涵意蕴、价值遵循与实践路径 [J]. 现代教育管理, 2023, (11).

[6] 饶玉婕, 成楚洁, 许世建.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视阈下技能型社会建构的系统性思考 [J]. 职教论坛, 2023, (8).

[7] 李英利. 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推进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3, (7).

[8] 邵文琪, 王刚, 刘晓. 共生理论视角下职业启蒙教育资源整合的困境与突破 [J]. 教育与职业, 2021, (7).

[9] 杨瑜, 吴遵民, 陈晓雨. 职业教育“污名化”困境溯源及突围路径 [J]. 现代远程教育, 2023, (4).

[10] 王敬杰. 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 内涵解构、运作机理和实践路径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3, (16).

[11] 宋亚峰. 贯通·融通·联通: 职业本科院校专业结构的适配逻辑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3, (6).

[12] 郭璇瑄, 陶红. 数字经济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研究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1).

[13] 王俊杰, 林玲. 科教融汇视角下职业院校概念验证中心的建设逻辑与发展路径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4, (2).

[14] 谢拙政, 曾绍玮. 职业教育科教融汇的实施价值、机制构建及实现路径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3, 44 (22).

[15] 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3, 40 (6).

[16] 宋亚峰, 潘海生.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谱系图构建研究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3, (5).

[17] 黄一鸥, 么加利. 科教融汇视域下高职教育“三教”改革的新要求与现实路径 [J]. 教育学术月刊, 2023, (10).

[18] 金蕾. 产教融合生态系统的优化路径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3, 45 (S2).

[19] 刁均峰, 韩锡斌.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J]. 现代远程教育, 2021, (6).

[20] 冯新广, 吴小平, 夏伟.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路径选择与院校作为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3, (11).

[21] 徐玉成, 王波, 朱萍. 科教融汇赋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及破解对策 [J]. 教育学术月刊, 2023, (9).

[22] 白玉婷, 李中国. 职业教育科教融汇: 为何与何为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3, 44 (13).

[23] 许世杰, 崔发周, 张帅. 构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国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工作研讨推进会综述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3, (30).

[24] 冯海芬. 市域产教联合体: 内涵特征、价值意蕴与建设路径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3, 44 (25).

[25] 贺书霞, 孙超, 冀涛. 数智化赋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探索 [J]. 教育与职业, 2024, (3).

作者: 崔慧姝,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副教授、博士
常洁,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
周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钟晓媚

(上接第83页)

[12]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概况 [EB/OL]. <https://giis.gdufs.edu.cn/index/gu/gk.htm>, 2023-12-20.

[13] 广州市舆情大数据研究中心简介 [EB/OL]. <https://xwxy.jnu.edu.cn/2019/0118/c12846a322832/page.psp>, 2019-01-18.

[14] 浙江大学信息资源分析与应用研究中心. 2022全球智库影响力评价报告 [EB/OL]. extension://bfdogplmndidlpjfoijckpakkdjkkil/pdf/viewer.html?file=https%3A%2F%2Fciraa.zju.edu.cn%2Freport%2Freport20231124.pdf, 2023-11-24.

[15] 余晖, 闫赵凌云. 高校智库融入湾区发展的机制创新研究 [J]. 城市观察, 2021, (6).

[16]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J]. 党史文汇, 2016, (6).

[17]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 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5/t20220527_631453.html, 2022-05-27.

[18] 曹昭乐. 构建学科——智库互促关系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12-10.

[19] 智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访布鲁金斯研究院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 [J]. 决策与信息, 2009, (8).

[20] 靳诺.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建设和发展 [J]. 中国高等教育, 2019, (20).

[21] 李鹏虎.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 基础、难点及突破 [J]. 世界教育信息, 2022, 35 (9).

作者: 曹科岩,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长青老龄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 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新时代高等职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李亚军,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修琦